

# 以“第二个结合”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邹广文教授

本刊记者

邹广文，男，1961年生，内蒙古赤峰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教学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委员会主任。中组部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兼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化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哲学、当代文化与社会发展以及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1篇。先后出版了《当代文化哲学》《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论》《社会发展的文化诉求》《乡愁的文化表达》《文化理想与文化批判》《当代中国的文化矛盾与文化走向》等学术著作6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重点项目1项、一般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1项，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项，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项。代表性成果曾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了“第二个结合”。他指出：“‘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sup>①</sup>关于“第二个结合”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引发理论界的热烈讨论，成果颇丰。那么，如何把握“第二个结合”的深刻意蕴？如何回归本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如何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为此，我们专访了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邹广文教授。

## 一、“第二个结合”：化解传统与现代紧张关系的时代命题

▲（采访者简称▲，下同）：邹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长期深耕于文化哲学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您认为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点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对于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文化就像一条河，从“过去”经“现在”流向“未来”。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文化的重要性日益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理论与实践价值研究”（24&ZD209）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7页。

凸显，我们所面临的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文化的世界。就我国而言，文化建设问题现在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sup>①</sup>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多年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走到了为世界瞩目的舞台的中心地带，成为影响世界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正是到了这一历史节点，我们发现我国不仅要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更要成为一个文化大国，甚至是文化强国。但是，客观来讲我国的文化发展相比经济发展还是相对滞后。我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是还很难说是一个文化产业大国。如何把我们丰厚的、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转化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发展实践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越来越在战略维度上重视文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文化自信”的重要论断。他指出，相较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sup>②</sup>。为什么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的自信呢？因为文化是一个社会进步的灵魂，社会进步的最根本标志就是文化进步。

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非常强调文化对于革命斗争的重要性。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专门论述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认为我们的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sup>③</sup>。此外，他还强调：“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sup>④</sup> 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发表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演。其中，在谈到军队建设时，毛泽东讲过一句非常中肯的话：“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sup>⑤</sup> 所以，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依赖于文化建设。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文化问题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正是基于对文化自信的关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文化“双创”，即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为未来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建设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思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两个结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从而深化了对“两个结合”的理论认识，明确了“两个结合”的实践指向。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指导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中国化时代化，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论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特别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深层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在“第二个结合”的视域下，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挖掘马克思思想的现代价值诉求？

●：实际上马克思思想本身就呈现了一种先进的现代性理论，彰显了人类现代化实践的理想之维。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来看，工业革命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提高。在旅居英国期间，马克思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带来的先进性一面和残酷性一面。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更加全面地审视与批判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性思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人类现代化的宏大历史实践中展开的。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页。

②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6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11页。

从其现代性思想的具体展开来看，我们发现马克思思想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将英法的政治经济学和德国的国民经济学进行对比，得出德国式的现代问题。“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德国式的现代问题，说明我们的历史就像一个不谙操练的新兵一样，到现在为止只承担着一项任务，那就是补习操练陈旧的历史。”<sup>①</sup>这说明马克思已经关注到德国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并得出结论：“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sup>②</sup>因此，马克思认为，要想从现实生活的胚芽出发，就得推行有原则高度的实践。之后，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遇到了“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便选择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相比国民经济学家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并将其抽象为一般的公式，马克思看到工人在现实劳动中的异化、非现实化。由此，马克思认为，“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sup>③</sup>。马克思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沦为工人满足肉体需要的手段，成为工人随时想要逃离的“瘟疫”。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得出结论：“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集中表现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所达到的非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而同时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被无法再回避的、无法再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所逼迫而产生了对于这种非人性的愤慨，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sup>④</sup>基于这样的时代使命，马克思恩格斯清算了之前的哲学信仰，扬弃了青年黑格尔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考察了现代工业、交往、文明等，并把“现实的个人”置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起点，系统批判了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从而转向了唯物史观。

▲：那么，您认为我们应当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中汲取哪些智慧和方法呢？

●：以往学界有人认为，200多年前的马克思思想已经不能完全解释今天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发展现实。但是事实恰恰相反，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分析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今天依然占据真理和道义制高点。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来，因其科学性、实践性和开放性一直处于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之中，对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实践发挥着巨大影响，从而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首先，马克思不仅致力于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研究结论概括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sup>⑤</sup>也就是说，马克思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视为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钥匙，从而为人类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指导。这意味着马克思的现代理论不再是一种抽象的逻辑运演，而是现实的社会生活发展，是以人类的吃、喝、住、行为中心的社会历史的演进过程。

其次，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不是某种教条主义的理论，而是一种变革现实的实践方法。马克思在剖析资本逻辑时采取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一方面，他肯定了资产阶级在人类现代化发展中的贡献，“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sup>①</sup>；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给世界各个民族带来的伤害，甚至是反人性的一面。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sup>②</sup> 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掠夺其他民族的“海盗式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其他民族无法走向自身独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资本进行的批判既揭示了现代化社会的实然维度，即“世界怎么了”，又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应然维度，即“我们怎么办”，为落后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一种方法。因此，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sup>③</sup>

最后，马克思对现代性思想的阐发不是“完成时”，而是面向未来的“进行时”。晚年的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对唯物史观的思考，而是将其运用到东方社会作进一步的考察。此外，马克思还阅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以期进一步完善唯物史观。在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进一步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针对当时德国年轻人把历史唯物主义变成套语的现状，恩格斯给予了批判，并认为其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这说明，作为一种方法，马克思主义是面向未来的、生成的、开放的。正是由于其开放性和未来指向性，当它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就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

▲：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经历了复杂的探索过程，并且在不断地回答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您可以围绕这一问题谈谈您的理解吗？

●：好的。谈及现代化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何为“现代化”。“现代化”一词始于西方，学界通常认为人类现代化开始的标志就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从词源学的角度看，“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词来源于“现代”（modern）。早在5世纪，“现代的”（modernus）一词就以通俗的拉丁文出现，源自“modo”，指“最近、现在”。“modernus”通常指目前的、当下的或同时代的东西，因此“现代的”就与“古代的”相区别。5世纪“modernus”一词刚出现时还不涉及时间问题，那时现代与古代的分并不体现在时间上，而且两者的区别是完全的且绝对的。从文艺复兴开始，人们逐渐认为“modernus”包含从古代到现代的进步观，这一概念才逐渐具有时间性的维度。到18世纪，“现代”一词主要用于语言、服饰等。到19世纪，“现代”一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成为时代的主流。

在《韦氏新大学词典》中，“现代化”具有三层意思：与传统相对的现代的特征，最新的技术、方法或观念，语言发展的特征。从“现代化”一词的历史演变和含义来看，一个国家或民族要想实现现代化，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关系。西方社会作为现代化的先驱者，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让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生产 and 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sup>④</sup>。但是，马克思也从价值维度看到了资本主义带来的血腥与残酷。资本主义盲目地扩大再生产，采取暴力掠夺、买卖奴隶和征服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殖民地等行径，掠夺巨大的财富，控制世界市场。

实际上，人们从西方现代化实践所暴露的问题中逐渐意识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传统，而是要在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丰富现代性。德国学者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认为它是“世界籍幻象的统治”，并将它界定为“由来已久的存在背景中的新奇”<sup>①</sup>。为了找到现代性的发源，本雅明深入“原始森林”去“描绘原始的空间”<sup>②</sup>。他认为，现代性世界最终是一个由商品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支配地位所造就的幻想和假象的世界，所以必须唤醒以往的记忆，即人们心中关于传统的记忆和故事。

我们进一步把视角从西方社会转到东方社会。现代化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悲喜交加的过程。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国门被坚船利炮打开，中国被强行拖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参与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被动屈辱的。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始终围绕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展开：洋务派强调在物质层面学习西方的产业，也就是说，他们主张实现物质的现代化，但在思想观念上仍固守传统。到了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离不开社会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因此要引进西方的制度。但是，当时的人们虽然剪掉了身体上的“辫子”，但心里的“辫子”仍然在。针对这一情况，新文化运动以“德先生”“赛先生”为师，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反传统的道路，旗帜鲜明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在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始终是挥之不去的话题。这就意味着，妥善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您刚刚提到“第二个结合”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您觉得“第二个结合”是否化解了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关系。如果是的话，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尤其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一系列变革图强尝试失败，这使得当时的国人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逐渐形成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即要走向现代，就得拒绝传统；要民族的传统，就要拒绝现代。这种思维模式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让中国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这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我们先前的思维模式。我们逐渐发现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上也可以长出现代化的丰硕果实，这也促使我们重新理解人类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sup>③</sup>。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指出“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其中“第二个结合”成功化解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实现了又一次思想解放。对于这一论断，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第二个结合”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是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彼此契合的前提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根基，其蕴含的天下为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家国情怀，深深植根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

① [英] 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59页。

② [英] 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60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页。

这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强烈的契合性，它们都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存在。这也回答了为何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言，“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sup>①</sup>。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的闪电”一旦击中中华大地，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契合，由此走向二者的有机结合。

第二，“第二个结合”是一场深刻的“化学反应”，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相互成就，进而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近代中国在探索传统与现代关系时更多局限于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将西方现代化视为定于一尊的标准模式，而不是一种面向未来建构理想社会的方法。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的思想理论引入中国，尤其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我们开始意识到传统与现代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而是能够在现代化实践的展开中实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一过程不仅使中华文明得到生命的更新，而且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经由“第二个结合”实现的新文化，成功解决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历史难题，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崭新的文化形态。

第三，“第二个结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空间，为在新时代探索传统与现代的新型关系打开了思考空间。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为人类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新的选择，“第二个结合”也为人类解决传统与现代关系的难题提供了思想路径。但面向未来，仍然任重道远。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新的政治智慧，把握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夯实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华文化传统。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在“第二个结合”中进行探索与创新。

## 二、“第二个结合”：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时代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的论述，我们注意到近期您围绕这一话题作了深度思考，请问您是如何关注这一话题的呢？

●：我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3期上发表了《回归自己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一文。其中我沿着高清海先生的思路，即“创造‘当代中华哲学’，实质就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sup>②</sup>，进一步提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核正是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而努力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则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个带有基础性、前提性的时代命题”<sup>③</sup>。

之所以需要对文化主体性问题进行自觉的学理思考，是因为这一问题在今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哲学界围绕人学问题进行过热烈讨论，在那样的大背景下呈现了主体性问题。实际上，主体性问题是人学应该关注的核心问题。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关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学术延展空间。首先，这个问题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关注的是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与目的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问题；其次，这个问题具有较强的辐射性，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论题密切相关；最后，这个问题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为人的现代化及其素质提升、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等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参照。

▲：请您具体谈谈如何理解中华文化主体性及其传达的基本精神。它孕育了怎样的中华文明特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18页。

② 高清海：《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③ 邹广文：《回归自己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3期。

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sup>①</sup> 这表明，文化主体性进一步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使其成为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具特色的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其中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首要特性，它从根本上保障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世界有四大古文明，分别是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从历史上看，其他三个文明并不是连续不断的，唯有中华文明从远古发展到今天，一脉相承、源远流长，这就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不仅仅是历史事实的连续性，更是价值诉求的连续性。从文化认同层面来讲，中国古代先民倡导的很多文化价值理念和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我们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主导文化，已经深深影响每个中国人的成长，每个人的血液中都流淌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这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持续注入动力。

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都是讲求“贵和持中、自强不息”。

“贵和持中”更多体现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也就是要“尚和”，要秉持中性智慧。把“和”“中”两个字放在一起，即“中和”，表达的就是中国美学所追求的“中和之美”。进一步看，“和”最原始的意义就是关注差异性，比如一唱一和就是两种以上不同声音的美妙搭配。也就是说，“和”本身不是单一的声调，因为单一声调不存在“和”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用“一唱一和”？你看船工号子、劳工号子都是一个人主唱、其他人附和，“一唱一和”就说明存在两种以上的声音。所以，“和”包含着差异性，意味着文化的多样性。因此，中华文化首先尚和，也就是孔子强调的“君子和而不同”，允许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思考。“持中”要求人们秉持一种中性的智慧，“中”就是不走极端。《易经》强调“允执厥中”，这个“中”就是克服两极对立思维，不走极端，追求中庸、中道、中和的人生志趣。中国传统文化在把握事物时强调要善于从两极到中间，善于把握事物的中间点。也就是说，我们思考任何问题都不要执着于非白即黑、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因为这不利于事物的健康发展。“贵和持中”体现在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上，就是做任何事不走极端；体现在不同文化形态上，就是要相互包容。这种包容就体现在中国文化的“厚德载物”上。“厚德载物”与我们强调的“贵和持中”的道理是一样的，即要以博大的心胸、宽阔的胸怀去承载万事万物。正是由于“贵和持中”，不同文化之间在相遇时更多是美美与共地彼此相待，最后才可能达到互养相成的天下大同。所以，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诉求保证了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相互欣赏、相互借鉴，甚至通过他者文化来折射出自己的不足，从而激活自身的创新能力。

中华文化“自强不息”的价值诉求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层面。如果说“贵和持中”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自强不息”强调的则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千百年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深深融入中国人的血脉，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勇争先、锐意进取的不竭动力。在面对自然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一方面要培养不屈不挠、征服自然的态度，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与自然产生良性互动，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比如大家熟悉的传统文化命题“天人合一”“天人不二”，就是讲要“尽心”“知性”“知天”。正如儒家文化强调的，在个体向外延伸的过程中，天和人之间并不是一种完全的对立关系，而是“天道即人道”，因为“天行健”，所以人要“自强不息”。这使得中国人在对待自然的态度的上建立了一种良性认知，即儒家强调的“正德”“利用”“厚生”的态度。“厚生”就是要敬畏自然、要顺应自然，到今天我们也秉持这样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

<sup>①</sup>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9页。

努力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要顺应自然，要培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当代表达。我们要自强不息，但是在此过程中要呈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把和谐的内涵呈现出来。

总之，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上要坚持文化的多样性，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要强调和谐共生。只有从这种文化态度出发，我们才能保证未来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

▲：您认为文化主体性如何影响和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实际上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我们今天之所以要特别关注儒家和道家的文化资源，是因为儒道互补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即“贵和持中，自强不息”，在儒道两家的思想体系中都有所体现。儒家历来主张“刚健有为”“允执厥中”精神，在这里我们不展开说明。老子在《道德经》中主张“上善若水”“道法自然”，其实这就是一种中性的人生智慧。老子认为，上善作为最高的德行，其表现像水一样。那么，水有什么特点？老子在解释水的时候强调，水主静，静水照大千；水居下位，但水通过“善利万物而不争”“故几于道”；水没有形状，却“大象无形”，即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水也改变自己的形状。由此看来，中华文明的确是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呈现方式，但是其内在文化品质并没有改变，始终强调“贵和持中，自强不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可以非常融洽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例如，我们主张作为学者要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学问，“入世则信孔孟，出世则信老庄”。一个人做学问首先你要沉下去，要始终面对生活世界，葆有人生关怀。有了这种关切，你的学问才能真正接地气，在面对百姓苍生时才能言之有物。同时，还要有出世的情怀，培养独立的人格和超验的人文关怀。

今天整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每个人工作紧张、生活繁忙，神经绷得太紧。外在世界的喧嚣浮躁恰恰需要我们借鉴中华文化的价值来调整我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强调文化主体性还是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的。

▲：最后，您觉得“第二个结合”在何种意义上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和传统的自觉意识，是对其文化生命的根本维系，是面向未来不断开放创新的超越意识。从传统的视角看，“第二个结合”使文化主体性有了坚实的文化根基，也就是说我们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得传统文化在当今焕发出新的意义与价值；从现代的视角看，在“第二个结合”视域下我们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从而增强了文化自信，坚定了走向未来的底气；从未来的视角看，“第二个结合”开启了广阔的文化空间，使我们能够进一步发展文化的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和辐射力。

###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未来发展的文化气象

▲：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系？

●：就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形态来看，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成表里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指涉的是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现实生活的全面进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上延伸、发展并生成的文化气象。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中华文明以现代性的实践力量，是赓续中华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因此，我们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促使中华文明进行生命更新，建设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其次，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精神气质，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催生出的文化气象。这里的“文化气象”指的是在文化实践空间中呈现出来的图景和样态，是人们随时随地都能感知和体验到的社会文化品质。这种文化气象兼具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折射了个人和社会的文化素养、精神特质和价值观，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文化呈现，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样态，所以二者之间是双向赋予、相得益彰的关系。我们相信，以“第二个结合”为指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一定能在中华大地上结出新的灿烂的文明果实。

▲：担负新的文化使命，您认为我们还需要破解哪些时代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每个中国人要自觉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里所讲的“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其最广阔的背景就是我们进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到2050年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我认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与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课题息息相关。

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包含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因此文化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个角度看，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求我们守正创新，也就是说要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丰富滋润新的文化的成长。文化的守正创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要求我们在坚守中华文化根本的基础上不断结合时代需求进行创新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从“两个结合”中总结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脉”，这就需要我们自觉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历史传统和基本理念，对传统文化有深入的理解和尊重。

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步入第46个年头，关于文化的讨论始终不绝于耳。我在《学习与探索》1986年第4期上发表了《东西方文化传统与人的现代化》一文，我认为中国真正步入经济全球化、面对世界时，古今中西的关系问题始终是绕不开的话题，其中古今的问题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今天我们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强调传统的现代转化，这样一来“古今问题”必然会与“中西问题”相交织，也就是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如何看待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问题。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种认知强调，一种文化只有自觉自信，才有可能在世界舞台上把自身的魅力展示出来，这种文化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先进文化的生成要素。我们今后要做的工作是，随着中国经济大踏步前进，我们的文化也要产生世界性影响，即在世界上要看到中华文化在现代人类生活中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这表明我们中国人对现代化的理解进入新的自觉层面。我们坚信，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基于本国国情对人类现代化的理解和设计，能够成功破解古今中西难题。以上这些问题是我们面向未来新的文化使命要具体解决的重要问题。

▲：2007年您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当代文化哲学》一书，引发了学界的关注。时隔十多年，请问您如何看待当下我国文化哲学的发展？当前我们强调“第二个结合”，您认为文化哲学研究是否迎来了又一个“春天”呢？

●：目前关于“第二个结合”的学术讨论十分热烈，这是一件好事。伴随改革开放大潮，我国的文化哲学研究已经走过了40余年的历程，其间文化哲学研究也经历了自身的“变”与“不变”。所谓“变”，意味着不同国家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常常面临不同的文化实践难题，这些难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20多年前，我们的文化哲学研究更多地是“向外看”，即学习、借鉴、模仿“他者”。如今，我们发现西方在现代化实践中暴露出诸多问题，这促使我们转头“向内看”、反求诸己，注意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资源，为我们提供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在此意义上，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下转第97页）

过程进一步抽象化和数字化为生产要素，从而纳入其剥削体系，拓展了资本积累的范围。

面对当代西方认知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切中问题的实质：一方面，分析认知资本主义新的资本增殖方式，能够帮助我们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及其出场逻辑；另一方面，这一分析提醒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sup>①</sup>，其中就包括警惕资本对认知劳动的吸纳，防止其带来新的社会不平等。总之，我们要注重实现技术发展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警惕资本全球化过程中认知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支配问题，推动我国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实现自主创新。

#### 参考文献：

- [1] [德] 沃尔夫冈·施特雷克：《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贾拥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
- [2] [法] 让-雅克·朗班：《资本主义新论》，车斌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
- [3] [英] 奈格尔·思瑞夫特：《认识资本主义》，闫婧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 [4] Franco Berardi, *The Soul at Work: From Alienation to Autonomy*, Los Angeles: Semiotext (e), 2009.
- [5] John Holloway, *Crack Capitalism*, London: Pluto Press, 2010.

(编辑：刘曙辉)

(上接第17页)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不仅凸显了我们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视，更彰显了中华民族在迈向世界舞台时的文化自信。应该看到，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相较于经济发展而言，其发展是相对缓慢的，但影响却是持续深远的。在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人们会越来越感觉到文化对于国家和民族行稳致远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今天强调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更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既是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文化哲学研究“不变”的方面就体现在现代化凸显了人与文化的矛盾，因此文化哲学要始终置身于人的文化世界，追踪人类现代化实践中所呈现的种种文化问题，并试图予以破解。简而言之，人的全面发展仍是文化研究的价值旨归。我在《当代文化哲学》一书中提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既是马克思学说的中心问题，也是当代文化哲学的核心价值取向。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还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都离不开“人的现代化与全面发展”这一主题。这意味着，每个人作为主体既要在事实维度回答“我是谁”，展示人与社会的有机联系并实现人的社会本质，更要在价值维度回答“我应当成为什么”，满足人的历史文化诉求，塑造人的理想人格。正如马克思所言，作为灵魂与肉体的二重性存在，人在满足自身生理需求的基础上还拥有对于真、善、美的理想追求。今天我们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就更加凸显了人在文化发展中的价值与意义。如果说人是哲学的奥秘，那么理所当然人也是文化哲学研究的奥秘。因此，面向未来，我们的文化哲学研究不能离开对人的关注。

(编辑：刘曙辉)

<sup>①</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19页。